

卡斯特罗主义

理论和实践

西奥多·德雷珀著

(供内部参考)

卡斯特罗主义

理論和实践

西奥多·德雷珀著

北京編譯社譯

(供内部参考)

Theodore Draper
CASTR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5
根据紐約普雷格出版社 1965 年版譯出

• 供 內 部 参 考 •

卡 斯 特 罗 主 义

理 論 和 实 践

〔美〕西奧多·德雷珀著

北京編譯社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編印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三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 · 字数 187,000

1966 年 3 月第一版 1966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3·848 定價 (五) 1.10 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什么是卡斯特罗主义?	7
第二章 失去社会地位的人的革命.....	56
第三章 卡斯特罗的经济学.....	128

附 录

富布賴特参議員和美国政策.....	208
-------------------	-----

索 引.....	236
----------	-----

序

vii

在战争、革命与和平问题胡佛研究所主持下，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革命国际一百年”的讨论会，我应邀为该会撰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就成了本书的基础。论文的题目是《什么是卡斯特罗主义？》。为了简短起见，我不得不把我的论点加以压缩，只研究卡斯特罗主义的性质及其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根据需要，论文主要着眼于进行分析，虽然我认为最好给分析提供一个历史的框框。可是，一般说来，我主要感兴趣的并不是按年代叙述全部史实，而是剖析和探索卡斯特罗主义的基本要素或特征。 viii

在写好这篇论文以后，我决定进一步进行研究，扩大分析的范围。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为胡佛研究所撰写的论文只研究了卡斯特罗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明显特征。这就使我不得不把大部分篇幅用来强调它的策略方面。但是，我早就不满意目前流行的关于卡斯特罗革命的社会性质的一些理论，例如“土地革命”论，所以我决定研究一下这种理论以及其他有关的理论，以便对卡斯特罗主义作出更加符合于古巴社会结构和人所共知的古巴近年来历史事实的“社会解释”。然而，在探索这样一种更能站得住脚的社会理论的时候，我并不打算处处遵循历史编年顺序。我只是在需要说明或证实我对革命进行社会分析的某一个论点时，才研究古巴社会的某些方面，援引各种史实和言论。我希望我已经把历史脉络说清楚，不致于使读者感到茫无头绪。

第三章是从理论过渡到实践。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卡斯特罗不

断变化的經濟政策及其实践效果上,但是在这里,我所研究的东西也不完全局限于經濟。从取得政权以前到取得政权以后,卡斯特罗主义在革命策略和經濟政策方面有一个发展过程,我认为必須把貫串这整个发展过程的一根或几根紅綫找出来。因此,这不是一本历史、社会学或經濟学的专门著作,尽管其中可能有不少历史、社会学和經濟学。或許可以更恰当地說,这是一篇历史、社会学和經濟学彼此掺杂着的論文,旨在說明一种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而目前还不容易明确說明的活生生的政治現象。

ix 我不打算涉及教育或文化这类領域,因为它們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問題。例如在教育方面,卡斯特罗政权宣布一九六一年的扫盲运动已經使文盲接近于消灭。然而,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工业部长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却透露出,文盲依然大量存在,以致有必要禁止工业部管轄的一切单位雇用他們。原来的吹噓所依据的只不过是小学一年級的識字水平,这可以說明何以 analfabetos(文盲)并不比过去有多大长进。無論如何,在这个領域里,对质量的估計至少是和数量統計同样重要的,而我对于有关这方面的吹噓或批評都无法判明其真偽。就本书主要涉及的問題來說,更加有关系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成为古巴教育制度的官方意識形态,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各种程度和水平的人灌輸,而我們对卡斯特罗政权进行的任何政治分析可能都需要考虑到这一事实。

古巴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古巴、苏俄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对我的主题來說有着重大得多的意义,但是,我不打算詳細談論它。我相信讀者会从字里行間发现我的一般看法,即卡斯特的古巴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它不是任何其他共产党政权的翻版、它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是实际上的从属地位和独自的野心的一种混合。但是,关于古巴和苏俄、共产党中国

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問題,如果要談出一点真知灼見,就需要进行极其詳尽的、严谨的和长篇的研究。在本书的有限范围之内,我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虽然我触及了这个問題的某些方面。

我采取了传统的提供史料的做法,以便任何人都能够自己去判断和研究。在这个存在着激烈爭論的問題上,看来最好是把我所使用的資料来源告訴給严肃的学者和感兴趣的讀者,即便是可能产生脚注連篇累牘的危險也在所不惜。我也列举了我据以得出結論的許多事实,因为很多資料即便在我們最大的圖書館里迄今也还不容易找到。遺憾的是,在古巴发生目前这场革命以前,在我国研究拉丁美洲問題的学者們当中,专门研究古巴的人可以說寥寥无几,革命以后也很少有人对它特別注意。这个题目大都留給新聞記者了,而新聞記者們即使具有最良好的主观意願,也沒有进行这种艰苦、細致的研究工作的時間或素养。

我碰巧感到兴趣的这个题目,要求于研究者的不仅仅是到古巴去呆几天或几个星期,同一些人接触,在向导的指引之下或者沒有安排地游覽一番,获得一些万花筒式的印象而已。我本人就到古巴和另外一些地方作过这样的旅行,但我并不想輕視这段经历。我們不能够坐待历史学家日后告訴我們目前发生了什么事。在某种意义上讲,古巴革命已經古老到使新聞記者不再能掌握它的全部内容,而又还没有陈旧到足以使历史学家对它进行学术性的分析。可是,我們已經被卷进了这场革命,我們必須利用手头的材料力求理解它,而如果从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无疑是不够充足的。纵然如此,現在就开始从新聞报道过渡到历史研究也不算为时过早。在我看来,只有把革命作为一个整体——貫串它那些看来相互矛盾的不同阶段——并且把活生生的现实和逐漸消逝的过去結合起来观察,才能够对比較深刻的問題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我們需要追溯的过去愈远,现在的个人接触、旅行和

印象所能告訴我們的东西也就愈少。

xi 举例說，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不同的時間說過許多不同的話，以致我們已經不再能根据他在某个时候可能說过的某些話来判断他的为人。要弄清楚他現在或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沒有捷徑可走的；我們必須研究——至少是閱讀——他那些还没有汇编成书的連篇累牘的演說，非常遺憾，舍此而外別无他途。这些演說也許并不能把我們想要知道的东西全都告訴我們，但它們使我們知道的东西却远远超出于他想讓我們知道的东西。原因很簡單：他无法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預見到哪些話在几年以后会显得不謹慎或有失立場。他无法預見到，哪些在問世的时候一度显得非常真誠甚至是天真的宣言和声明，以后会由于不适合屡屡变化的路綫和环境而被打入历史的冷宮。

这本书还給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更深入地重新研究和考虑我曾經論述过的古巴問題的某些方面。新的材料和更长远的透視使我改变了对某些問題的看法。举例說，卡斯特罗在一九六一年似乎把主要的权柄交給了老共产党人。他也是个这样做，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但这仅仅是一个阶段。关于这件事，我們現在了解的情况比当时所能了解到的要多得多；問題不仅仅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現象，而且在于这种現象为什么又在后来消失。另一方面，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毋需改变我对卡斯特罗主义的基本看法。

我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的《記者》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古巴問題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結尾說：“卡斯特罗曾經把他的革命說成是‘有面包而沒有恐怖的自由’。如果他繼續操之过急、做得过分、走得过远，古巴就可能有更多的恐怖，而且既沒有面包又沒有自由。”我从不后悔我作过的这个預言。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脫稿、一九六一年三月发表于《遭遇》杂志（伦敦）和《新領袖》

周刊(紐約)上的一篇文章中,我把古巴革命称做共产主义革命“族系”的一个“变种”,同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变种”相似。我对于古巴革命研究和考虑得愈多,我的这种看法就愈加坚定。 xii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对古巴革命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和思考以后的結晶品。假使我沒有得到許多慷慨的帮助和耐心的支持,我是无法把这样多的時間花費在这个問題上的。在这五年中,以下这些机构先后为我提供了进行研究工作的条件:

洛克菲勒基金会,特别是杰拉尔德·弗隆德博士。

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該机构前主任默尔·范索德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問題研究所及其所长茲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教授。

斯坦福大学战争、革命与和平問題胡佛研究所及其所长 W·格倫·坎貝尔博士。

但是,本书的实际写作是在胡佛研究所里完成的,在那里,我作为高級研究員能够完全自由地和独立地工作,就像在前面提到的另外三个机构中的情形一样。

正如我已經說过的,第一章原来是为一九六四年十月在胡佛研究所举行的討論会撰写的。第二章是专为本书写的。第三章大約有一半在《評論》杂志上发表过。另外,针对参議員 J·威廉·富布賴特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演說,我曾經在《新領袖》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經過一番修改和补充以后,也被我收入本书,但只是作为一篇附录,因为它们并没有直接談到卡斯特罗主义本身,只是討論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但是,因为它涉及同本书的主要内容間接有关的一些重大問題,我还是把它收进了本书。 xiii

最后,我要向我的得力顧問和益友安东尼奥·德·拉·卡

雷拉表示衷心的謝意。我也感謝華金·戈多伊的寶貴幫助。費利克斯·弗里曼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始終不厭其煩地給了我很大的支持。特別是我的妻子一直給我以幫助和鼓舞。我在此向他們致謝。當然，書中的觀點只能由我個人負責。

第一章

3

什么是卡斯特罗主义？

“什么是卡斯特罗主义？”这个问题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卡斯特罗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有什么样关系？”我们迟早要谈到这个问题的，也许越早越好。对于两种完全对立的见解，其答案是比较简单的。有人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是而且过去也一直是一个共产党人；另外有人坚持说，他现在不是而且过去也绝不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个问题对于像我自己这类人来说，就更复杂得多了；我们这类人认为，卡斯特罗在掌握政权以前，从一切实用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在其后某个时候才决定和共产党人共命运的。

但是，不论我们持有一种什么样的见解，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第一派人必须说明为什么直到进入一九五九年以后很久，卡斯特罗同共产党人之间还存在着公开的意見分歧和严重的对立；第二派人必须说明，为什么卡斯特罗和他的最亲密的伙伴们现在自称是共产党人并且认为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第三派人则必须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各不相同，他们的道路又是怎样一致起来的。的确，我们既然能够一目了然地提出卡斯特罗主义同共产主义是否有关系或怎样发生关系这样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就预先假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即使这只不过是种与类的差别。

为了明确卡斯特罗主义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一直接的目的，我们不妨把卡斯特罗主义的历史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

7

区别开来。没有卡斯特罗，这个运动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把这个运动降低到就是卡斯特罗其人。这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形式在整个拉丁美洲存在着，而且它的影响，甚至在欧洲、非洲和其他地方都为人们所感受到。菲德尔·卡斯特的诞生比卡斯特罗主义的出现大约要早二十五年，因此，他比他的运动要老一些，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要更复杂一些。在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政治现象，即卡斯特罗主义，而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的全部个人历史。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

从历史上说，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卡斯特罗主义是不存在的。这天，即巴蒂斯塔夺取政权十七个月之后，发生了攻打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这一行动使卡斯特罗第一次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个人追随者的政治人物而出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存在及其名称也就起源于此。

- 5 关于这个运动的概念看来是在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卡斯特罗被监禁在皮诺斯岛(松树岛)这段期间具体地制定出来的。就是在这段时期内，他实际上写成了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他受审时发表的目前这个形式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篇演说。据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说，卡斯特罗曾经要求她和艾德·圣塔马利亚(这是两个曾经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妇女)采取最初的步骤以便组织新的运动。她们要求他给她们一个“行动纲领”^①，

① Francisco de Armas, “Como se editó en la clandestinidad la Primera Edición de La Historia Me Absolverá,” *Hoy*, July 21, 1963, section 2, pp. 2—3. 作者说他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材料是梅尔瓦·埃尔南德斯提供的。

作为执行这项任务的基础。看来，卡斯特罗已经想到要把这样一个“綱領”以辯护辞的形式引人注目地在审讯时提出来。他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写了一封信給梅尔瓦·埃尔南德斯，他在信中提到“一个由于思想内容和广泛的指控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秘密印行。^①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这个小册子要比那篇演說具有多得多的“綱領性”，他在发表演說的时候，心里的打算以及所考虑的听众对象并不是一样的。^②

从政治上來說，这个小册子作出諾言要恢复一九四〇年的宪法并产生一个“民选政府”，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提出关于革命后接踵而来的那个时期的令人不安的但书。在农业方面，它的主张主要是进行土地改革以限制大地产而增加小土地所有者的数字。它只是略略提到了鼓励“农业合作社”的問題，这里明显地是指为独立的土地所有者提供服务的組織而不是指那种实施国家控制的机关。演說中最激烈的論調——在古巴人听来并不是这样——也許就是簡短提到的要把美国人拥有的各个电气和电话公司“国有化”的那段話。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或令人吃惊的东西。这个小册子总的來說不过是一本包括了人所共知的种种弊病及其医疗方法的汇编，是古巴政治界早已司空見慣的东西，特别是卡斯特罗当年名义上所属的那个党的創始人、已故的爱德华多·奇瓦斯所

① Luis Conte Agüero, *Cartas del Presidio* (Havana: Editorial Lex, 1959), p. 37. 写这些信的确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② 关于印行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来历，至少有两种不同的、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它是以审讯时的“速記记录”或“速記记者的记录”为根据的。以后有一种说法是上述 de Armas 的文章和一九六四年版《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附录中提出的，說这是“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的“复制品”，沒有提到曾經借助于速記记录，据說，这种记录会使一个“复制品”陷于不必要的冗长和瑣碎 (Havana: Editora Política, 1964, pp. 205-6)。除非将原本拿出来，否則就无法說明“复制品”和原本有多少相似之处。

实行的东西。^①

正如古巴人所了解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改良綱領,完全没有越出传统的古巴左翼政见的范围。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古巴在共产党人以外还有过一个和共产党人对立的、壁垒分明的“左翼”,甚至可以說是“革命的左翼”。实际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的社会和經濟綱領沒有哪一点是不可以一直追溯到ABC党(最大的反馬查多組織)的一九三二年綱領或格劳·圣馬丁博士的古巴“真正党”的一九三五年綱領,更不用說以后的奇瓦斯的宣传了。

7. ABC党的一九三二年綱領包含一个十七点的經濟計劃,其中特別提到发展并保护农村的小地产,逐步消灭大庄园,限制美国公司取得土地并采取把美国公司国有化的措施,組織生产者合作社,公用事业国有化,采取进步的社会立法,以及給从事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古巴人以优待。同一綱領还曾提出过五項基本原则:新人、新思想和新程序、重新开拓土地、政治自由、社会正义。^②“真正党”的一九三五年綱領則是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政治上的三位一体为基础的。^③

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取得政权以后,人們习惯于引用《历史将

① 奇瓦斯曾經是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反馬查多独裁斗争中的学生領袖之一。一九四七年,奇瓦斯分裂了由当时的总统拉蒙·格劳·圣馬丁創始并领导的执政党——古巴革命党,組織了一个反对党——古巴人民党。这两个党通常被人分別叫做“真正党”和“正統党”。奇瓦斯于一九五一年自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五〇年前后在党内变得活跃起来,一九五二年作为古巴人民党的竞选古巴議會議員的候选人。但是,由于巴蒂斯塔在同年三月十日发动政变,选举沒有举行。

② 參見 Carlos G. Peraza, *Machado, Crímenes y Horrores de un Régimen* (Havana: Cultural, S. A., 1933), pp. 215—50, 中 ABC 党綱領全文。

③ Ramón Grau San Martín, *La Revolución Cubana ante América* (Mexico City: Ediciones d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Cubano, 1936), p. 104.

宣判我无罪》这篇演讲，或者不如說是小册子，好象它就是在他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整个时期中唯一的重要文件。某些亲卡斯特罗的作者甚至煞费苦心地要表明这个文件预示了卡斯特罗后来的共产主义。但是，奇怪的是，卡斯特罗本人竟然感到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这个文件没有更激进些。他后来说，他当时写这个文件是“很谨慎的”，以便提出若干基本观点而不致使他所要发动的运动成为“非常狭窄、非常有限”。他暗示，发表出来的他的言论并不像他内心里所想的那样激进。“如果我们不是很谨慎地来写这个文件，如果这是一个更激进的纲领——虽然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說，很多人对于纲领有些怀疑而且往往不很注意它——那么，反巴蒂斯塔的革命运动当然也就不会达到它所达到的那种规模，而且也就要使胜利成为不可能的了。”^①卡斯特罗在另一场合指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所以具有永久的价值，与其說是由于它在“经济和政治观点上的理论价值”，不如說是由于它“生动地揭露了巴蒂斯塔暴政的全部恐怖和罪行”。^②毫无疑问，他所說的是对的。

8

但是，他在一九五四年又写了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远不是那么出名；这些东西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一年，他给正統党的一个领导人、著名的电台评论员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写了許多封信，请求帮助他組織要求大赦的运动，并向他吐露了一些有关他的那个即将出現的运动的内心深处的想法。

他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写道：“我应当把七月二十六日的人员組織起来，把那些流亡的、关在监狱中的和流浪街头的全体战士团結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团体。”他解释说，他們将形成“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的核心”，并提供“夺取政权所必要的力量，不論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还是通过革命的手段。”然后他又以少有的坦率精神

^① *Revolución*, December 2, 1961.

^② 同上, March 28, 1962.

写道：

“組織一次真正的公民运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意識形态、紀律和領導。三者都是必要的，但領導則是根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拿破侖說的，在战斗中，一个坏的將軍比二十多个好的將軍更起作用。如果在組織一个运动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不同任何人商量就公开发表声明，那么要組織一个运动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运动是由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組織起来的，这些人在最初发生意見分歧的时候就各行其是，分裂并破坏指导机关，那么也不可能指望这个运动能有任何成就。宣传和組織机构必須是这样一种机构而且必須是这样地强而有力，以致能够毫不容情地粉碎任何一个企图制造反对运动的傾向、集团、派系或叛乱的人。”^①

在这三个条件中，卡斯特罗过問得最少的显然是意識形态这个条件。真正使他感到兴趣的是其他两个条件：“紀律”和“領導”，特别是后者。他的“領導是根本的”这句名言同法西斯主义和庇隆主义等的“領袖原則”运动所具有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同共产主义的“意識形态与党性”运动所具有的关系。很难設想，一个共产党人会使用卡斯特罗給孔特·阿圭罗的这样一封非常說明問題的信中所使用的語言。

卡斯特罗自一九五五年五月从皮諾斯島释放出来以后，只在古巴呆了六个星期，以后就前往墨西哥去为未来入侵古巴而进行准备。七月十九日，即他到达墨西哥后不到两个星期，他召集了他的追随者开了一个会，正式决定发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②用发生象征性事变的日期来命名新的运动，这在拉丁美洲是个普通的做法，但是，卡斯特罗居然决定模仿这种做法却并不是沒有意义的。他所利用的这个日期象征着一种英雄的行为或姿态，并不象征一

① Conte Agüero, *Cartas del Presidio*, pp. 60—61.

② René Ray, *Libertad y Revolución* (Havana, 1959), p.11.

种政治哲学或革命传统。这种行为或姿态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是某种永远也没有人能够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这是他建立领导的基础。

一九五五年八月，卡斯特罗给哈瓦那古巴正統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去了一个賀信，他在信里试图公开闡明新运动的主张，这还是这个运动成立以来他第一次这样做。他把这叫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致古巴人民的第一号宣言”，它实质上同《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路綫是密切一致的。它要求所有希望“重建政治民主，扶持社会正义”的古巴人給予支持。它保证要在“我們的先进的”一九四〇年宪法的精神和文字的范围內实现所有的“改革”。它包括了一个从“在农户中間分配土地”到“沒收一切貪官污吏的全部财产”这样一些改革的十五点綱領。但是，在这个宣言中，卡斯特罗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一个正統党党员，“忠于”奇瓦斯的“最純洁的原则”，并希望得到“最优秀的正統党人”的支持。为了一面留在党内一面又在党外組織自己的运动，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說：“我們并不是要在党内形成一种傾向；我們是奇瓦斯主义的革命工具。”事实上，他更多地是声称代表一个要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比較有效的“工具”，却不那么強調自己代表一种政治傾向。^①由于奇瓦斯本人始終是一个积极反共的人，任何一个像卡斯特罗那样声称是他的忠实信徒的人势必就要沾染上奇瓦斯的一部分名声。

一九五五年年底，正統党的领导决定和其他一些反对党一道，

① 引自一份我所保存的这个宣言。宣言的全文显然从来没有被再刊印过，但是，我們可以从下述文件中找到它的摘录：Luis Conte Agüero, *Los Dos Rostros de Fidel Castro* (Mexico: Editorial Jus, 1960), pp. 104—7, 和……y la luz se hizo: *declaraciones del Comandante Fidel Castro Ruz, Primer Ministro del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en el juicio Contra el ex-Comandante Hubert Matos, Ciudad Libertad, December 14, 1959* (Havana: La Secretaría de Propaganda de la 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Cuba, n.d.), pp. 86—90.